

历代中医

中国中医药学会文献学会

中国中医药文化研究会

全国医古文研究会

本草名著集成

主 编 张瑞贤

副主编 常章富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草名著集成/张瑞贤主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10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高文铸主编)

ISBN 7-5080-1349-2

I. 本… II. 张… III. 本草专著-古籍-汇编 IV. R28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567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16 开本 83.25 印张 2202 千字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13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

名誉主编 张文康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继兴 王冬川 王绵之 郭维忠
史常永 吕炳奎 刘渡舟 李金鼎
余瀛鳌 张灿理 陈可冀 陈忠
尚志钧 施秉那 钱超尘 郭霞春
程莘农 董建华 焦树德 任应秋

总 策 划 王智钧 房书亭 张 伟
主 编 高文铸
副 主 编 李俊德 刘日一 张 伟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伯海	牛兵占	伊广谦	刘日一	刘更生
李俊德	张 伟	张年顺	张瑞贤	胡晓峰
徐又芳	高文铸	郭君双	黄龙祥	盛维忠
蒋力生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序

高 文 铸

成功之道,读书为要。不管做任何学问,都是如此。古往今来,凡是在某一学科有成就的人,莫不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怎样读书?先哲早有明训:第一要精,第二要博。“精”就是专门深入,精研细读;“博”就是广泛浏览,博极群书。精博相兼,成功就在眼前。

学习中医当然也不例外。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千秋不朽;药圣李时珍“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著成《本草纲目》万代永传。要想成为一代名医,就要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古今一理,中外皆同。

科学是有继承性的,特别是中医这门实践性很强的学术,需要多少代人的不断摸索和积累。古人在实践中摸索积累的临证经验,主要依靠中医文献作为载体延续发展。书以记文,文以载道,道以育人。历世流传的中医典籍,便是仁人志士步入医学殿堂的阶梯。

学以致用,困知勉行。读书与实践,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作为一个医生,读书必须结合临证,临证不能脱离读书。历观古今名医的成长道路,都毫不例外地把读书与临床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勤奋读书,反复实践,不断总结,又各自把读书心得和临证治验记录下来,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献宝藏。

面对这些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盲目阅读或漠然置之都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些浩瀚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科学分析,深入钻研,由博返约,去粗取精,发扬光大。这样才能避开前人走过的弯路,把前人宝贵的经验继承下来,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索未知的境界。尤其在受到西医的强烈冲击,中医临床实践机会相对减少的今天,师法古代名医名著则更加不可或缺。

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广泛传播和充分利用祖国医学这份宝贵遗产,满足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读书、临证的需要,在华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智钧先生、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张伟先生的精心策划和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文康先生、中国中医研究院党委书记房书亭先

生、中国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李俊德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中医药学会文献分会、中国中医药文化研究会、全国医古文研究会联合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在传世的近万种中医古籍中,经过反复论证,严格筛选,编纂了这套《历代中医名著文库》丛书。

《文库》以历代流传广、社会影响大、临床实用价值高为选书原则。根据中医学术发展的演变规律、当今中医药学的学科建制和中医药古典医籍的保存现状,共分为十二大类,计有《医经病源诊法名著集成》、《伤寒金匱温病名著集成》、《本草名著集成》、《方剂名著集成》、《针灸名著集成》、《内科名著集成》、《外伤科名著集成》、《妇科名著集成》、《儿科名著集成》、《五官科名著集成》、《综合类名著集成》、《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所收著作均以中小部头为主,大部头著作则单本刊出。每类《集成》少则收书十余种,多则二十余种,基本上代表了本学科古典医籍中最精华的部分。

《文库》以完整保存古籍、方便今人阅读、有利于学术研究为整理准绳。每种入选书目均以初刻本或最佳版本为底本,保持内容的完整性,不删一字一图。整理以点校为主,校注文字力求简明扼要,不作繁琐考证。每种入选著作均写有点校说明,叙述本书的著述缘起、成书过程、书名由来、体例结构、内容梗概、学术源流、学术评介、版本流传,以及后世研究概况、本次点校方法。每类《集成》书前撰写前言一篇,充分叙述本学科的学术发展历史、所涵盖的内容和学术特点、主要典籍及其存亡流传演变,以及本次整理情况。每类《集成》书后附有“未收名著书目提要”,条贯群书,部次甲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引导读者了解和利用更多的典籍。从整体上看,每类《集成》既是该学科历代医籍的选粹,又是研究该学科学术内容的文献通鉴,具有永久的收藏和使用价值。

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俗谚曰:“求人不如求己,求师不如求书。”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是您的良师益友,置诸座右,恒而学之,它将使您步步走向成功。即使博雅之士,大方之家,插架翻检,知而后读,亦为治医之一助。

1997年元旦于中国中医研究院

前言

中药,古称本草。本草学即我国传统的中药学。

本草的渊源可一直上溯到茹毛饮血时期的原始社会。《淮南子·修务训》云:“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蠃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堯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可以看出以传说中神农氏为代表的先民是在如何艰难的境况下去发现药物的。

据现存文献记载,“本草”一词最早见于西汉。《汉书·郊祀志》即记载有“本草待诏”的官职,颜师古注曰:“本草待诏,谓以方药本草而待诏者。”在《平帝纪》中也提到,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楼护传》中又记载“(楼)护随父为医长安,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可见在汉代,“本草”一词已成为一个特定名词,为当时人们所接受和理解。

本草文献的问世当不晚于本草这一名词的出现,尽管当时并不一定称之为本草。本书既然作为“历代本草名著集成”,就有必要对本草文献的历史作一简单的回顾。

(一)

先秦至汉,有不少书籍如《诗经》、《山海经》及《五十二病方》等都记载有各种药物,但都不是药物专著。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大概可以算1977年在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的被命名为《万物》的残简。这批残简计130余片,其中记载药物约有七八十种。这些药物大部分都是被用来治疗某种具体疾病的,少数则是保健性或间接地有益于人的。如“石番之令弱(溺)不遗也”(W003),“见(贝)母已寒执(热)也”(W005),“东与醢使人不龟手也”(W010)。胡平生、韩自强通过与《山海经》、《博物志》、《淮南万毕术》、《神农本草经》的比较,提出“它当然不是那种理论性、系统性很强的药学医学专著,而让人感到很像是一个富于生活、生产知识的长者的经验之谈。它的文字也像是师学相传、口授言教的记录。”并考证认为,它至少是战国时期或更早的“本草、方术”著作。但是这部书的内容还是太简单了。

本草学的奠基之作应是大约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现在可见到《神农本草经》的多种辑复本,但这些辑复本基本上都是以《证类本草》白文为蓝本的。实际上,在宋代编写《证类本草》时已见不到《神农本草经》原书,而是通过唐《新修本草》间接阅读,而唐代看到的则是通过经南朝梁·陶弘景整理过的《神农本草经集注》。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序例中说:“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七十九,或四百三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树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多少,医家不能备见,则识致浅深,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草》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是在总结各种版本的《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再加入《名医》所用药物,参以自己的见解撰写而成的,并以朱笔书写《本经》内容,墨笔书写《别录》内容。由此可知,我们今天也只有通过《证类本草》等来认识《神农本草经》了。说《神农本草经》奠定了本草学的基础,主要在于它的贡献上。首先确定了三品分类法,将药物按养命、养性、治病归类,开药物分类的先河;其次在序例中提出了分类原则、配伍、七情、四气五味、采收、鉴别、调剂、用药及服药方法等,奠定了药性理论的基础;其三,创单味药的记述体例,为后世提供了掌握认识新药的方法和准则。

本草文献发展的主线是围绕着《神农本草经》而展开的。延续这一主线的著作几乎都涵括《神农本草经》的内容,这似乎是主流本草著作的一个标志,也是历代本草文献中一个独有的而区别于其他医学著作的显著特征。如上所述,在《神农本草经》基础上,南朝梁陶弘景编写了《本草经集注》。虽然陶弘景对《本经》、《别录》或许有所改动,但《本经》、《别录》还是靠《集注》才得以流传。《集注》在本草史上亦占有重要位置,取得了巨大成就。首先,《集注》将《本经》的三品分类法发展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七类,首创按自然分类法;其次,对药物的性味、产地、采集、形态、鉴别、采制加工、炮制、剂型等的记载都比《神农本草》有明显进步;其三,更重要的是总结出了诸病通用药,即将药物按功能分类,为临床检用提供了方便。是书大约散佚于宋代,今惟存敦煌残卷。而唐《新修本草》将其全文收入,使后世得观其全貌。

唐代显庆四年(659),政府颁布了《新修本草》,这是我国第一部官修本草。当时的人们已经发现《集注》的编写由于“时钟鼎峙,闻见阙于殊方;事非金议,诠释拘于独学”,而有不少疏漏。“如重建平之防己,弃槐里之半夏;秋采榆仁,冬收云实;谬梁米之黄白,混荆子之牡蔓;异繁菱于鸡肠,合由跋于鸢尾;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钩吻黄精,引为同类”等等,急需编写一部反映当时药学发展的综合性本草著作。于是右监门府长史苏敬向朝廷提出了重新编修本草的建议,经准后由政府组织名医儒臣等20余人参与这项工作。书成后名《新修本草》。原书五十四卷,其中正文二十卷,目录一卷;药图二十五卷,目录一卷;图经七卷。本书的主要贡献是对当时幅员广阔的大唐地域所产药物进行了实际普查,并绘制了药物图。“普颁天下,营求药物,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它保存了《本经》、《别录》的内容和体例,并作了大量补正。“《本经》虽阙,有验必录;《别录》虽存,无稽必正”。凡药物正文或来自《本经》者,都用红字书写;凡药物或正文来自《别录》者,一律用墨字书写。新增注文冠以“谨按”,接在陶弘景注说之后。新增药物一遵《本经》、《别录》体例,未注“新附”。全书新增药物114种,分类由陶弘景的七类扩展到九类。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中京兆府三原县尉陈藏器,收集《新修本草》不载之药物692种,编成《本草拾遗》一书。其残存序例中有“十剂”内容,丰富了药性理论。是书的问世补充了《新修本草》的不足,将唐代本草学成就推向了新的高峰。书虽早佚,而大部分内容却被宋代的《证类本草》收录。

五代后蜀时韩保升曾奉诏据《新修本草》编成《重广英公本草》一书,后称《蜀本草》。该书包括《新修本草》全文、唐本《图经》部分、韩保升新增等三部分内容。《蜀本草》新增的内容,大多被宋·掌禹锡收入《嘉祐本草》中并分别冠以“蜀本”、“蜀本注”、“蜀本图经”作为标识。

宋代是官修本草次数最多的一个朝代。第一次是在开宝年间,宋太祖先后两次命人修订本草。开宝六年(973),尚药奉御刘翰、道士马志等9人奉旨以《新修本草》为基础,并参考《蜀本草》和《本草拾遗》等修订本草。书成后又由左司员外郎知制造扈蒙、翰林学士卢多逊等勘定,定名为《开宝新详定本草》,习称《开宝新定本草》。共二十卷,宋太祖作序,国子监刊印。《新定本草》勘正了别名,增加了新注与新药,但仍有不足,“所释药类,仍有未允”。于是,宋太祖在次年又下诏重加校定。经翰林学士李昉、知制造王光祐、扈蒙等共同校定,“乃以白字为神农所说,墨字为名医所传”。并以“唐附”表示《唐本草》新增,“今附”表示《开宝》续添。小字注文凡署以“今注”,即“详其解释,审其形性,证谬误而辨之者”;署以“今按”,即“考文记而述之者”。又增加了一些药物,厘为二十一卷,定名为《开宝重定本草》(简称《开宝本草》)。是书所确立的本草著作编纂体例为后世的主流本草所沿用,实现了本草著作由传抄向雕板印刷的过渡。是书不传,但内容被收录在《证类本草》中。

第二次是在嘉祐二年(1057),宋仁宗命太常少卿直集贤院掌禹锡、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林亿、殿中丞秘阁校理张洞、殿中丞馆阁校勘苏颂,同医官秦宗古、朱有章等增修《开宝本草》,在编纂过程中又有太子中舍陈检、光禄寺丞高保衡等加入这项工作。在嘉祐五年完成,定名为《嘉祐补注神农

本草》(简称《嘉祐本草》)。《嘉祐本草》收录药物 1082 种,其中新定 17 种,新补 82 种。《嘉祐本草》的体例十分严谨,标记清楚明晰。它以《开宝本草》本为准,对其卷类分布、经注要文、朱墨书写等,一从旧例,不复厘改。凡在原有基础上增加的内容,均于端始冠以“臣禹锡等谨按某书云”;另立条者,则标记书名。凡引用诸书,以《新修本草》、《蜀本草》为先,记为“唐本云”、“蜀本云”,他书则按时代先后排次,以作者名标记“某人”。字有朱墨之别,凡源于《本经》者书以朱字;《别录》增补者,则书以墨字;凡药条为陶隐居所补者,均谓之《名医别录》,并以其注附于末;《新修本草》新增者,在其末注“唐本先附”;《开宝本草》新增者,注为“今附”;《嘉祐本草》自增者,则标为“新补”;历代本草著作皆未记载,当代却已应用者,则请太医众议而定,名为“新定”。凡注释内容也严格标识,如出陶弘景者标“陶隐居云”,出《新修本草》者标“唐本注”,出《开宝本草》者标“今注”。若为《开宝》考据传记内容增补者,则依照原例仍为“今按”、“今详”、“又按”等。《嘉祐本草》在参考文献上也比《开宝本草》广泛,其中仅本草文献就有 16 种,并一一对其进行了扼要的介绍。本书业已失传,其内容较完整地收录于《证类本草》之中。

在编《嘉祐本草》的次年,即嘉祐三年,掌禹锡等奏请朝廷,“用永徽故事”,在全国性药物普查的基础上,撰写《图经本草》。宋仁宗采纳了这一提议,诏令“下诸路州县应系产药去处,并令识别人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着花结实,收采时月,所用功效。其番夷所产药,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客商,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资,送当所投纳,以凭照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图经本草》的编纂由苏颂负责,他首先“裒集众说,类聚论次”,使当时所上绘事千名,及世医所闻见,“粗有条目”,然后据请酌处,或正讹纠误,或填缺补漏,遂于嘉祐六年撰成是书。全书二十卷,目录一卷。由于《图经本草》的内容大多直接来源于第一手资料,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书已佚,其全部文字和大部分药图被收录于《证类本草》中。

然而,由于《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分别刊行,致使应用十分不便。杭州名医陈承将二书合一,并“发明余蕴,以古今论说与己所见闻,立为议论一篇,篇端冠以‘谨按’两字,间列《图经》之书”。书成,名《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该书已佚,其中有 40 余条“谨按”被《大观本草》收录,并冠以“别说云”于文首。

与此同时,四川民间医生唐慎微也在做同样的工作。他以《嘉祐本草》为基础,并入《图经本草》,再加增补,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一书(简称《证类本草》)。书凡三十卷。书中凡有药图的条文,其药图“图经曰”为《本草图经》内容,二者之间为《嘉祐本草》的内容,墨盖子以下却为唐氏新收内容,并以大字标明出处,以小字记录内容。药条中,除 8 味为唐慎微自己所增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为历代本草中虽载,而后世罕用或已淘汰的药物,唐氏都标为“××余”,其中有“陈藏器余”488 种、“唐本余”7 种、“海药余”16 种、“食疗余”8 种、“图经余”5 种。再者,唐氏又将《本草图经》中“外草类”、“外木蔓类”编成一卷,列于书后。此外,唐氏还首创以方药并收法编纂本草的先例,在许多条文后附录前代医籍方书或当代民间以本品治病疗疾的单验方,以印证药物的性能效用。因唐氏在编纂本书时参考了数百种经史子集各类文献,故《证类本草》内容翔实,资料可信度高,历代都给予极大的重视。这么大一部著作,当时的唐慎微是无力刊刻的,“其书不传,世罕言焉”。其内容后被收入《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之中。

北宋末年寇宗奭针对《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中的疏误,撰成《本草衍义》二十卷,政和六年(1116)上呈徽宗。该书前三卷为序例,后十七卷为药物,载药 570 余种。在编纂原则上该书不收录与《嘉祐本草》重复的内容,在内容上以辨药与论理紧密结合,对后世影响很大。元代朱丹溪有《本草衍义补遗》一书。因本书可以补充《嘉祐本草》等书的不足之处,故常被合编于其中,尤其是元初

张存惠将其逐条散入《重修政和本草》中后,该书的单行本反而逐渐失传。

《大观本草》全称《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三十卷,目录一卷。刊于大观二年(1108)。当时集贤孙公“得其本而善之,邦计之暇,命官校正,募工镂板,以广其传”。《大观本草》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证类本草》的一个版本,因为其中尚有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的内容,被冠为“别说”。《大观本草》今有流传。

在《大观本草》刊刻后不久,即政和六年(1116),宋徽宗命医官曹孝忠等重修《大观本草》,曹氏等人“朝夕讲究,删繁缙素,务底厥理。诸有援引误谬,则断以经传;字画鄙俚,则正以字说。余或讹戾淆互,缮录之不当者,复随笔刊正,无虑数千。”书成命名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共三十卷。本书今有多种版本流传,蒙古张存惠晦明轩本(即《重修政和本草》)是《证类本草》的最主要版本。

南宋时医官王继先会同太医局教授高绍功、柴源、张孝直等根据《大观本草》校定增删,“参校诸家,别其同异。若夫物性寒热补泻,有毒无毒,或理之倒置,义之相反者,辨其指归,务从主当,形象则本旧绘,画以大纲,取识则不敢臆说,执以有据。考名方三百余首,证舛错八千余字”。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成书,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全书三十一卷,目录一卷。因王继先名恶,本书也受诟评,故在国内见不到《绍兴本草》的刻本,现日本有多种残抄本,我国大陆仅存日本春阳堂影印本。

元代曾有官修本草的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5),元世祖“命翰林承旨撒里蛮、翰林集贤大学士许国桢、集诸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元史·世祖本纪》)到二十五年“太医院新编《本草》成”。最近有学者从文献上进一步证实了当时编纂《大元本草》的可信性。如姚燧《牧庵集·卷二十九》“南京路医学教授李君墓志铭”载:“君姓李,讳纲……中统元年,制授南京路医学教授,至元二十一年改襄阳医学教授,寻诏尚医:‘今以《本草》中土物且(苴)遗阙多,又略无四方之药,宜遍征天下医师夙学多闻者,议板增入’。”在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资善大夫太医院使韩公行状”中也记载:“初,世祖以《本草》为未完成书,命征天下良医为书补之。公承命往,以罗天益第二十八人应诏。”如今对这部《大元本草》的具体内容和失传原因仍不得而知。

明代也有一部官修本草著作,这就是由太医院判刘文泰领衔编修、成书于弘治十八年(1505)的《本草品汇精要》(简称《品汇精要》)。全书四十二卷,目录一卷。收药 1815 种,增补 46 种;收药图 1358 幅,新增 366 幅。与唐宋官修本草不同,当时并未利用政府优势对全国药材进行普查,而仅是对《证类本草》加以改编。《品汇精要》将药物分为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等十部,在注释上打破了《证类本草》等主流本草层层加注的方法,采用 24 项注释方式,具体为:名,列述别名;苗,记述药物的生长过程及其形态等;地,记述产地;时,记述药物的采收时间;收,记述药物的贮藏方法;用,记述药物的药用部位及质量优劣等;质,描述药材饮片质地与形态等;色,介绍生药及其饮片的色泽等;味,论述药物的味;性,论述药物的寒热温凉收散缓急软等药性;气,论述药物的厚薄阴阳升降等;臭,记述药物的腥膻香臭朽等;主,列述药物的主治病证;行,记述药物的归经;助,论述药物的配伍佐使;反,记述药物配伍的畏恶相反;制,列述药物的炮制方法;治,记载药物的治疗效果;合,论述药物的应用配伍;禁,论述药物的妊娠、证候禁忌及用法用量所禁;代,列述药物的代用品;忌,介绍服用该药的饮食禁忌和炮制所忌;解,介绍该药能解何种毒;贗,列述药物的伪品及鉴别方法。《品汇精要》的药图是宫廷画师绘制的彩色图谱,为该书价值最高的部分。该书新增药物不多,新内容主要为“谨按”。在编写过程中,由于刘文泰及宦官与儒臣的矛盾,致使儒臣退出编纂工作,是该书编纂质量下降,文献价值不高的原因之一。书成后,一直藏于大内,未能及时刊行,故《品汇精要》未能起到主流本草及官修著作的作用。

在明代,真正能称得上主流本草的当属《本草纲目》。李时珍编著此书,“始于嘉靖壬子(1552),终于万历戊寅(1578)”,历时27年,稿凡三易而成。全书“分为五十二卷,列为一十六部。部各分类,类凡四十。标名为纲,列事为目。”载药1892种,其中李时珍新增374种。以个人力量编纂这样一部包罗万象的本草巨著,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李时珍不畏艰辛,悉心治学,他以《证类本草》为蓝本,“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书考八百余家”,并深入民间,访采四方,收集药物,采集标本,如此博采诸家,删繁正误,去伪存真,理用并举,大大提高了这部巨著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在相当于总论的序例中,列举本草历史和明以前各家药性理论,在“百病主治药”中虽沿袭诸病通用药旧例,而类列则更加详细和贴近临床应用。各卷药物的分类更加科学,“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菜、果、木,从微至巨也。次之以服器,从草木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各条药物的列述,先“标其纲,而附列其目。如标龙为纲,而齿、角、骨、脑、胎、涎皆列为目;标粱为纲,而赤、黄粱米皆列为目之类。”各药的论释分为八个方面,“首以释名,正名也。次以集解,解其出产、形状、采取也。次以辨疑、正误,辨其可疑,正其谬误也。次以修治,谨炮炙也。次以气味,明性也。次以主治,录功也。次以发明,疏义也。次以附方,著用也。”此外,对所引文献出处的标识,也较《证类本草》有了进步,“但直书诸家本草名目于药名、主治之下,便览也。”《本草纲目》问世后,流传甚广。除万历二十一年(1593)金陵胡成龙所刻祖本外,尚有万历三十一年(1603)江西夏良心、张鼎思所刻的江西本、1640年钱蔚起刻于杭州六有堂的钱蔚起本、张绍棠光绪十一年(1885)刻于南京味古斋的张绍棠本三个系统。

至清代,本草著作虽各具特色,但综合性本草却很少,更谈不上主流本草。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武英殿监造赫世亨、张常住奉敕将弘治本《本草品汇》募造一部,太医院吏目王道纯、医士汪兆元奉诏校正文字。王氏等还仿照原书体例,编撰了《本草品汇精要续集》十卷,在康熙四十年修完。《续集》主要参照《本草纲目》,共载药488种。原书亦未流传,至1936年才有商务印书馆刊行、经王道纯校正的《品汇精要》及《续集》内容。

《本草纲目拾遗》是赵学敏所编纂,初稿完成于乾隆间,后陆续增补,最晚的增补为嘉庆癸亥(1803),共十卷。本书同《本草拾遗》拾《新修本草》之遗一样,是在拾《本草纲目》之遗。全书载药921种,其中716种为正品,205种为副品。皆为李时珍未言,或言之不详,或言之有误的药物。药物的分类在《本草纲目》基础上又分出藤部和花部,删去人部。全书引用文献600余种,有一些是现已失传的本草、方书,由于标明了出处,因而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

(二)

本草文献除上述主流之外,尚有其他丰富多歧的支流。

食物类著作的出现很早,历来多把这类书籍划分到本草类中,这与中国古代“药食同源”的观念有关。先秦时已有《神农黄帝食禁》等,汉以后这类著作更多,但至今已失传殆尽。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的弟子孟诜撰写了《食疗本草》,此书是唐代著名的食疗专著。现一般认为该书原为《补养方》,经张鼎改编增补而成《食疗本草》。全书共3卷,载药200余种。原书朱墨分书,文献来源不详,不少内容为唐初本草著作中所阙。原书早佚,今惟余敦煌残卷,藏英国伦敦博物馆。部分佚文载《本草拾遗》、《医心方》、《嘉祐本草》、《证类本草》中。其次,晋殷的《食医心鉴》也很有名,原书亦佚,部分佚文存《证类本草》、《医方类聚》中。五代时南唐医学助教陈仕良著有《食性本草》十卷。该书汇集了《本经》以下各主要本草中的食用药物,并增加个人见解,附以食医诸方及脏腑调养术。原书亦佚,其内容散存于《证类本草》中。

宋代也有不少食疗著作,如郑望之的《膳夫录》、娄居中的《食治通说》、陈达叟的《本心斋食谱》、《中朝食谱》、林洪的《山家清供》等,但多散佚。

元代,《饮膳正要》是一部著名的食物养生专著。天历三年(1330),饮膳太医忽思慧等编成此书。全书共三卷。其中卷三以单味食物为主,分条介绍每种食物的性味、良毒、功效主治、宜忌等,还配有食物图,按米谷、兽、禽、鱼、果、菜、料物归列诸品,计230种,附图168幅。本书有多种版本传世。其次又有吴瑞所撰《日用本草》,“取本草之切于饮食者,分为八门,间增数品而已。”(《本草纲目·历代诸家本草》)该书载食品540余种,现存明代刻本,书分三卷。

明代,朱橚编《救荒本草》。从根本上讲,《救荒本草》也是一种食物本草,但当时的食疗一般是对富人的,救荒则是针对穷人的。朱橚为了防备灾荒,派人咨访野老田夫,采集各种可以食用其根、苗、花、实的草木,种在自家的园圃中,并请画工观形绘图,汇编成册,书成于永乐四年(1406),全书二卷,收植物414种,其中有138种来自旧本草,新增276种,分为草、木、米谷、菜、果五部。后世多次刊行,今有多种版本存世。其后,大约在1530年,高邮人王磐,因见当时江淮连年水旱,担心饥民误食有毒野菜伤生,于是选择野菜60种,每种皆配以图、诗,编成《野菜谱》一卷。婺源人鲍山曾在家圃栽种可食野菜,又向僧道咨询可食蔬食,亲尝滋味,并参考《野菜谱》和《救荒本草》,在1622年编成《野菜博录》三卷,收野菜435种。明末姚可成将《野菜谱》更名为《救荒野谱》,又补充草类45种,木类15种,名《救荒野谱补遗》。成书于万历壬午(1582)的周履靖《茹草编》是一部消遣书,共四卷,分为茹草纪事和茹草纪言。汇集了李日华的《茹草解》、张之象的《飧英歌》、张服采的《采芝歌》、皇甫访的《烹葵歌》等。收载食物102种,绘图撰诗,怡然自得。

明代以《食物本草》为名的书很多,多是抄袭之作。据尚志钧等考证,题名元·贾铭的《饮食须知》、明·卢和的《食物本草》、明·汪颖的《食物本草》、明·吴禄的《食品集》、明·佚名氏《食物本草》(藏北京图书馆彩绘本)等皆抄袭自薛己的《食物本草》(即《本草约言》的卷三、四)。薛己的《食物本草》约成书于1520年,二卷,分为水、谷、菜、果、禽、兽、鱼、味等八部,载食物385种,每一种物品皆注出性味功效,亦多引述前人记载。

明末有一部《食物本草》,旧题元东垣李杲编辑,明瀕湖李时珍参订,显系托名。王重民等考证认为系明季姚可成撰,但仍有疑点。全书二十二卷。卷首录诸家论说及《救荒野谱》。将食品分为水、谷、菜、果、鳞、介、蛇虫、禽、兽、味、草、木、火、金、玉石、土等部,载食品多达1679种,是最大的食物本草著作。

明代的食物著作还有宁源的《食鉴本草》、韩奕的《易牙遗意》、高濂的《饮馔服食笺》、吴文炳的《药性全备食物本草》、穆世锡的《食物辑要》、赵南星的《上医本草》、孟桀的《养生要括》、施永图的《山公医旨·食物类》等。

清代食物著作多而杂乱,不乏抄袭之作,也有较优秀者。成书于乾隆六十一年(1795)的《脉药联珠·食物考》,系龙柏所作。一卷列“生民常食之品”1106种,补遗96种,分为水、火、五谷、造食、油、造酿、蔬菜、百果、茶、禽、畜、兽、鳞、介、盐等部,以四言歌诀形式论各食物,并通过眉批脚注补充个人经验。章穆的《调疾饮食辨》六卷,载食物653种,分为总类、谷、菜、果、鸟兽、鱼虫等类。卷首为总论,分别为述臆、发凡、《内经》饮食宜忌三项。各食物论述以《本草纲目》所载为主,结合历代各家之说,附以己见。该书的特色在于重视理论评述,见解新颖。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收各种食品327种,分水饮、谷食、调和、蔬食、果食、毛羽、鳞介七类,多为个人见解。陈仪的《济荒必备》三卷,实际为《蕪菹集证》、《辟谷补方》、《代匱易知》三种书的合编。

炮制制剂类本草著作在我国的出现也很久远,《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中记载的刘宋

徐叔响《本草病源合药要抄》和《本草病源合药节度》被认为是较早的制药著作。最负盛名的要属《雷公炮炙论》，其作者众说不一，一般认为是南朝刘宋时的雷敫。不过该书流传很少，直至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才广泛引用其内容，后世所引该书多据此。《雷公炮炙论》原书“直录炮熬煮炙，列药制方，分为上、中、下三卷，有三百件名”。在论述每一药材时，多在前面指出该药品特征及易与混淆品，因此本书又是较早的药材鉴别书。书中各药条所述内容均以实际炮制操作为主，兼及炮制所起的作用。本书问世后对炮制学影响很大，后世许多炮制著作皆以“雷公炮制”为基础而撰成。

宋代，据《通志略》载有《陈雷炮炙论》三卷，《宋史·艺文志》载有《制药法论》一卷，皆佚无考。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第一部中药制剂规范专著在宋代问世。是书在1080年由陈师文等修订而成，书名《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书中收录的很多方剂和制法，至今仍被采用。该书为中药制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今有多种版本流行。

至明代炮制专书开始增加，王文洁撰有《太乙仙制本草药性大全》八卷，托名“先师太乙仙人雷公炮制”。书分上下两栏，上栏为《本草精义》，下栏为《仙制药性》，上下两栏药物相互对应，共载药物768种，按草、果、米、谷、菜、人、金玉、石、水、兽禽、虫、鱼等部分列。该书于“太乙曰”下列述炮制法，内容多据《证类本草》所引《雷公炮论》，或以《宝藏论》等炮制法补入。缪希雍编著的《炮炙大法》，是明代又一部较好的炮制专著。该书由缪氏口述，门人庄继光录校。载药439种，按水、火、土、金、石、草、木、果、米谷、菜、人、兽、禽、虫鱼等部分列。卷前列“雷公炮制十七法”，各药条引录《雷公炮炙论》资料170余条，补充了一些后世制法的药物。该书在明代有一定影响。钱允治根据李中梓《药性解》改编的《新镌雷公炮制药性解》，将辑录的《雷公炮炙论》佚文附于《药性解》之下，“熬煮修事，种种俱悉”。清代炮制专书奇少，仅知有张骥的《修事指南》一卷，抄录《本草纲目》有关修治条文，集药200余种。

药性理论包括的内容很多，很早就有关于论述某一药性的本草专著，如曾被陶弘景引用的《雷公药对》，至少成书于后汉。南北朝时徐之才也有《药对》一书，主要论述药物间配合使用。其他还有张仲景的《药辨诀》，大约也是同类著作。题名陶弘景《药总诀》的自序，被收入《陶贞白文集》中，从中可知该书主要论述与临床用药有关的内容，不过这些书籍皆已失传。比较全面论述药性的药性本草专著出现较晚，唐代虽有一部《药性论》，但所论内容主要仍为综合性本草内容。真正的全面论述药性的药性本草专著到金元时期才得以兴盛发达。张元素的《珍珠囊》对药理学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该书以《素问·脏气法时论》等内容阐发药物与脏腑经络之间的关系，完善了药物归经与引经体系，确立了药物的阴阳升降浮沉补泻理论，将人身法象与药物法象相结合，在“诸品药性主治指掌”中例举药物90种，应用其理论简释各药物的作用机理。该书对后世影响极大，后被《医药集览》丛书收录，流传至今。李东垣著有《用药心法》、《用药法象》二书，原书均佚，内容见于《汤液本草》等书中。《汤液本草》为元代王好古所撰，书分三卷，卷上为药论，载有“五脏苦欲药味”、“脏腑泻火药”、“药类法象”、“用药心法”、“海藏老人汤液本草”，卷中下为各论，刊载药物228种，分列草、木、果、菜、米谷、玉石、禽、兽等八部，应用金元时期的药性理论诠释各药。

进入明代，药性本草专著仍呈上升势头。薛己的《本草约言》（约1520年）二卷，载药287种，分为草、木、果、菜、米谷、金石、人、禽兽、虫鱼等九部，除有对药物的一般介绍外，又引金元医家药论。杨崇魁的《本草真诠》（1602年）二卷六集，分别以运气、阴阳、经络统贯药物的阐述，多引据金元医家论述。明代影响最大的药性本草专著当属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简称《本草经疏》。据“梓行本草经疏题辞”载，本书的编纂历30余年，后由门人李季虹参录，付刻时原稿散乱流失。又由顾澄先检其存稿若干卷，按部选类，重汇复校，初刊于天启五年（1625）。全书三十卷，前两卷为续序例，

所谓“续”，即“续”《证类本草》之序例，分别为“药性差别论”、“论治吐血三要”、“论痰饮药宜分治”等药性理论文章与“诸病应忌药”七门。卷三至卷二十九，择取《证类》若干药物进行疏要，卷三十收《证类》未载或载之未详的药物，共载药物 490 种。各药论述主要为三方面内容：“疏”，阐发药性、主治的根由；“主治参互”，记载药物配伍及主治，引述各家方剂；“简误”，介绍容易混淆的药物品种、适应证等。由于本书系作者数十年经验之积累，加上结合脏腑理论等阐释药性、主治根由，见解独到，因而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贾所学的《药品化义》也是一部药性专著，后经李延昱补订，十三卷，卷首为李延昱所增，分别为本草论、君臣佐使论、药有真伪论、药喻。其后为贾所学原著，卷一“药母订例”提出了一个新的药学概念——药母，作为认识药物的一种规范，一种“辨药指南”。后十二卷以此理论统贯药物，载药 162 种，分为气、血、肝、心、脾、肺、肾、痰、火、燥、风、湿、寒等十三类，结构严谨，切于应用。清代尤乘在该书基础上分别在卷上增加“用药机要”，卷中下增补药物，遂成《药品辨义》一书。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十二卷，载药 365 种，原书分为核、参、衍、断四部分，后书毁，经回忆仅得核、参二项，其中以参为主要内容，分别以佛理、儒理推演医理、药理。此外，尚有顾逢伯的《分部本草妙用》，其在书中将兵书理论移用于医药，把药物按五脏分部，以仿兵阵；萧京的《药性微蕴》论述各家药论，结合个人见解，敷衍成一卷药论。明代药性本草著作的特点不同于金元时期，金元时偏重理论概括，难免失之于牵强，而明代多以临床为依据，临证本草著作与药性本草著作难以截然区分。

承明代余韵，清代仍有一些药性本草著作出现，但少有明代的大手笔。张隐庵、高世栻的《本草崇原》三卷，收药 289 种，其中《本经》药 233 种，附品 56 种。各药论述一般分为三项内容：药性正文、小字注文、阐释。阐释的特点是以经解经，从药物性味、生成、阴阳五行属性、形色等入手，结合主治疾病产生的机理，阐明《本经》所载药物的性效。成书于 1664 年的《本草述》是刘若金隐居后竭 30 年之力，十易其稿而成的药性本草著作。全书三十二卷，80 余万言。所收药物皆自《本草纲目》，编排次序也大致相同，共收常用药物 501 种，多为常用之品。在每药之下多列举金元以来诸家有关药性的论述，介绍药物的适应证、用药特点及用药机理等，在“愚按”中发表个人见解。受其直接影响，其后有杨时泰的《本草述钩玄》和张琦及蒋溶的《本草述录》等著作出现。郭佩兰的《本草汇》十八卷，成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至康熙五年（1666）始定稿。书中前八卷为医药理论，主要取自《本草纲目》及《本草经疏》和《本草通玄》等著作。后十卷分为草、谷、菜、果、木、虫、鳞、介、禽、兽、人、金石、服器、水、火、土等十六部，末附补遗。共收药物 485 种。王逊的《药性纂要》成书于康熙丙寅（1686），共四卷，系纂集《本草纲目》之要言而成，分类亦同《本草纲目》，载药 600 余种，重在辑录各家有关药性义理之说，个人见解以“东圃曰”标明。陈士铎的《本草新编》五卷，亦以探讨药性理论为要旨，引经据典，辨疑析奥，颇有发挥。《本草经解要》四卷，系姚球所撰，后被书商冠以“叶桂”印行。全书四卷，分草、木、竹、果、金石、谷菜、禽兽、虫鱼、人九部，共收药 174 种。该书按正文、注文、制方三部分论述各药，其特点是在论述药物性能应用时，紧密结合人体脏腑功能及病因病机。徐大椿的《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一卷，收录《本经》药 100 种，不但重视总结药物的“所当然”，更注重阐发其“所以然”，流传甚广。《得配本草》成书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为严西亭、施澹宁、洪缙庵三人合著而成。全书十卷，收药 647 种。重在阐述药物因配伍不同而效用主治相应扩大，以期“得一药而配数药，一药收数药之功；配数药而治数病，数病仍一药之功”。陈修园的《神农本草经读》四卷，成于嘉庆八年（1803），共收药物 165 种，其中《本经》药 118 种，所注“俱遵原文，逐字疏发。经中不遗一字，经外不溢一辞”，把崇古蔑今推向极端，是书流传极广，影响极大。又有邹澍著《本经疏证》十二卷、《本经续疏》六卷和《本经序疏要》八卷。前二部历时六年，于 1837 年成书。邹氏先取张仲景所用 173 种药物予以疏证，编成《本经疏证》，后取常用药物 142 种予以疏证，编成《本经续疏》。再仿《证

类本草·序例》“诸病通用药”体例,于1840年编成《本经序疏要》。前二书在先列举《本经》、《别录》条文之后,再附各家有关药论及个人见解,所收资料极为丰富。后一种,以病为纲,归类常用药,注其性味功效,相当于临床实用手册。在清代的药性本草著作中,有不少是依据药物的归经进行分类的,这种分类方式虽在明代已被顾逢伯的《分部本草妙用》采用,但未被广纳,直至清代才得以广传。较早的有岳含珍《分经本草》、唐千顷《本草分经分治》、吴应玘《本草分经》、盛壮《药性分经》等,皆佚。现存的有:刊于1838年的陈仲卿《寿世医窍》,其以十二经及冲任督三经、营卫等分纲,类列药物,简注药性;成书于1840年的包诚《十剂表》,全书根据其师张琦《本草述录》所载药物,按归经与十剂类列,纵为十二经,横为十剂。各药记性味、入脏、功效等,卷前列“十剂解”,阐述十剂义理及适应证,继列73种药名,正名及俗名。影响最大的是姚澜的《本草分经》,成于1840年,该书以经络为纲,以药物为目,是一部以归经来归纳药物的实用药性本草著作。此外尚有夏翼增的《引经便览》、张学醇的《医学辨证》、张节的《本草分经》等。以脏腑类列药物,始于明代江涵暾的《笔花医镜》,清代有吴古年的《本草分队》,按五脏六腑把药物分作十一类,各类又分补泻凉温四小类,每小类药又分猛将、次将。凌奂的《本草害利》也以此为基础编成。成于光绪十九年(1893)的《本草问答》和光绪三十年的《本草思辨录》已明显受到西方医药的影响,前者为唐容川所撰,二卷,以问答形式探讨医药理论;后者为周岩所撰,四卷,记录个人平日研究仲景及后世医家用药经验的体会。清代药物著作中已很少有不涉及药性理论而单谈临床应用的了。

临证实用本草是指配合临床各科而集录的本草著作,它与综合性药理学著作并无严格区别,只是这些著作侧重于临床应用而已。早期这类著作很多,皆已失传,如张仲景《伤寒论》序中提到的《胎产药录》即属于这一类。五代吴越国的《日华子本草》亦为此类,原书已佚,但《政和本草》中保留了其主要内容。据《嘉祐本草》“补注所引书传”介绍,该书“集诸家本草、近世所用药,各以寒温性味,华实虫兽为类。其言近用,功状甚悉”。被认为是一部实用性较强的临床药书。南宋的本草著作流传极少,《宝庆本草折衷》为其中的代表作,作者陈衍。书成于宝庆丁亥(1227),定稿于1248年。全书20卷,前三卷相当于总论,卷四至二十为各论,按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部及外草、木蔓类排列,共载药789种。每论正文集前人之说,后附“续说”阐述个人见解及增补资料,书末附“群贤著述年表”。本书所收内容大多适于临床实用。现仅北京图书馆存孤本残卷(缺卷四至十一)。元代尚从善“读书之暇,摭其切于日用者468品,取其义理精详,治法赅博,纂而成章”,于至顺二年(1331)编成《本草元命苞》九卷,当属此类。

明代临证实用本草亦明显增多。如王纶集取《证类本草》要旨而成《本草集要》三部八卷,三易其稿,于1496年成书。上部一卷为总论;中部五卷,分为草、木、菜、果、谷、石、兽、禽、虫鱼、人等部,收药物545种,各药先按君臣、性味、阴阳、良毒、归经、反畏等论述,后列功效及单方;下部二卷以药性分类,把诸药分为治气、治寒、治血、治热、治痰、治湿、治风、治燥、治疮、治毒、妇人、小儿等十二门,每门下又细分小类。是一部药性与临证相结合的本草著作。汪机曾受该书影响编撰《本草会编》二十卷。已佚。陈嘉谟总结以上二书及《大观本草》编写的得失,撰成《本草蒙筌》一书。书成于嘉靖乙丑(1565)。十二卷,卷首一卷。载药742种,分为草、木、谷、菜、果、石、兽、禽、虫鱼、人十部。卷首为历代名医图赞及药论。每药按性味、阴阳升降、良毒、反忌、归经、形态、炮制、功效、用药配伍等论述,间以“谟按”附载己见,重点讨论辨证用药。皇甫嵩的《本草发明》撰成于1578年,全书六卷,载药600余种,卷一为总论,择取金元诸家药论;卷二至六为各论,着力阐发药物主治、配伍要点。药分专治、监治两大法,末注药物形态、产地、采收、炮制等。张景岳的《本草正》实际上是《景岳全书》的卷四十八、四十九,有单行本印行。成书于1624年。载药300种,分为山草、隔草、芳草、蔓

草、毒草、水石草、竹木、谷、果、菜、金石、禽兽、虫鱼、人等 14 部。着力于辨析临床用药宜忌,每多个人独特见解,深受后世重视。倪朱谟的《本草汇言》二十卷系采同时代诸多学者经验而成,其中“师资姓氏”12 人,“同社姓氏”136 人。全书载药 581 种,分为草、木、服器、金、石、谷、果、菜、虫、禽、兽、鳞、介、人等 14 部。每药在药名下先介绍性味、阴阳、归经,再以小字注明产地、形态,然后集录各家之言,末附方剂,在各方旁用小字注明出处。卷二十为总论,收载药论 23 条,内容多采自《本草纲目》。

进入清代,临证本草著作仍复不少。王翊的《握灵本草》,始编于顺治丙申(1656),迄于康熙壬戌(1682),四易其稿而成。卷首一卷为序例,系节取《本草纲目》序例内容。各论十卷分为水、土、金、石、草、谷、菜、果、木、虫鱼、鸟兽、人等部,共载药物 419 种。另有补遗一卷,亦分部类,载药 190 种。各药论述有主治、发明、选方等项,内容亦多摘自《本草纲目》,是一部浅近的药物入门书。顾元交有感于《本草纲目》之浩繁,《本草经疏》之附会,乃编《本草汇笺》十卷,书成于 1660 年,载药近 400 种,以临床实用内容为主,重点介绍药物的性能,并附录验方。汪昂的《本草备要》是清代以来影响最大的本草著作之一。该书的初刊本载药 400 余种,康熙甲戌(1694)《增订本草备要》则增至 475 种,分为草、木、果、谷菜、金石水土、禽兽、鳞介、鱼虫、人等八部。卷前有“药性总义”,相当于总论。每药在名称下以小字简要介绍其主要功效,再以大字系统介绍性味归经、功效主治,在注文中阐发药理,然后介绍药材形态、加工炮制等。凡汪昂个人见解皆以“昂按”作为标识。吴仪洛的《本草从新》是在《本草备要》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他认为汪昂并非临床医生,专信前人,无所折衷,因而“因仍者半,增改者半;旁掇旧文,参以涉历,以扩未尽之旨”。书成于乾隆丁丑(1757)。全书六卷,载药 720 种,分为 11 部 52 类,部类名称多同于《本草纲目》。比《本草备要》更切近于临床实用。张璐的《本经逢原》成于康熙乙亥(1695),四卷。所列药物并不局限于《本经》,收载药物 784 种,皆临床常用之品,分为水、火、土、金、石、卤石、山草、芳草、隔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谷、菜、果、水果、味、香木、乔木、灌木、寓木、苞木、服器、虫、龙蛇、鱼、介、禽、兽、人等 32 部。各药论述除一般项目外,另有“发明”项,阐释药理及用药经验,并总结配伍方法等,切于实用。黄宫绣的《本草求真》成于乾隆己丑(1769),是清代一部不随波逐流,有真知灼见的著作。在分类上该书不采用常见的自然分类法,而是用功能分类法,前九卷将药物分为补剂、收剂、泻剂、血剂、杂剂、食物等部,部下又细分类,共载药物 521 种。书末又附卷后目录相当于索引,按自然分类法分列所载诸药,便于查阅。每部类前有提要,每药名下除注以序号外,兼注其自然属性。正文直叙药物性味、功能、药理等。末二卷为“主治”,分别为“脏腑病症主药”与“六淫病症主药”。该书对药理的阐述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主张“惟求理与病符,药与病对”,每有独到见解。

采药与栽培类本草著作应该是出现最早的本草著作,但文献极少,传世就更少了。其内容大部分都收在综合本草著作中,少有单行者。《七录》记载有《神农采药经》,《本草经集注》记载有《桐君采药录》,《隋书·经籍志》载有《入林采药法》、《太常采药时月》、《种植药法》等,《旧唐书·经籍志》中载有《四时采取诸药及合和》四卷,《通志·艺文略》载有《采药论》一卷,现存于《居家必备》丛书中,据《中国农学书录》考订,内容抄自《农桑辑要》。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中曾引述汪连仕的《采药书》、王安的《采药录》、王安卿的《采药志》等,原书皆佚。

歌括便读类本草著作出现较晚。在宋代《宝庆本草折衷》中引述的《本草简要歌》恐怕是既知最早的药性歌诀了,惜已佚。元代胡仕可所撰《本草歌括》,成书于元贞元年(1295),是现存最早的药性歌括书。该书收药 200 余种,每药附一图,以小字注明性味、归经、产地、形态、别名等,以大字书

写七言歌诀,叙述功能主治等,现有明代熊宗立增补本。从明代起药性歌诀类本草著作风行一时,品种极多,又多互相抄袭。有托名张元素或李东垣的《药性赋》影响较大,分为寒(60种)、热(60种)、温(54种)、平(66种)四赋,分别讲述药物的功能主治等内容。今见于《医药集览》中,与《珍珠囊》合刊。钱允治于天启二年(1622)将四性《药性赋》增补至320种,并加注释,成为四卷本的《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此赋卷一、卷二为逐段锦,文中称为“主治指掌”,载药90种,逐味讲述药物性味及功能;卷三、四仍为药歌。《岭南卫生方》卷下也附有《药性赋》,显然为后世所为,其体例与上书卷二相似,但无注,并多出39种药物,为129种。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的刘纯《医经小学》,卷一本草第一为“药性指掌”90首,标明“集次见东垣珍珠囊,增六十三味”。

龚廷贤的《万病回春》卷一为《药性歌》,有单行本,共载药性歌括240首,每药四句,每句四字,简述性味、功能主治,小字注释修治、反畏、禁忌等。后被邵达或王肯堂将此增入皇甫中《明医指掌》卷一,并增加简单注文,有些地方有改动。清代张仁锡将此歌诀扩充为《药性蒙求》。龚廷贤另在《寿世保元》甲集卷一本草门中有《药性歌括》,收药400味,编成四言药歌,与《万病回春》“药性歌”文字顺序基本相同,而药味增加,注文也有增加。清退省氏将此抄录单独刊行,名《寿世保元四言药歌》。

沈应旸编于1623年的《药性诗诀》为《明医选要》之卷九,摘录常用药物360味,加上补遗30余种,编为七言歌括。蒋仪撰于崇祯辛巳(1641)的《药镜》亦以韵语形式编成,共四卷,分为温、热、平、寒四类,共344种,每药以骈语讲述主治功效,后附“拾遗赋”、“滋生赋”、“疏原赋”等。刘全备的《新编注解药性赋》卷前为用药与四时治法的关系,卷末讲述各脏腑用药法及补真养性内容,正文赋用体大字,赋后用小字注出典、治验、性用、单方等。许希周的《药性粗评》四卷,分为草木、玉石、禽兽、人等四类,采用骈文简述药物主治功效,下注产地、品种、采收、性味、主治及附方。涉及药物1000余种。

罗必炜的《太医院增补青囊药性赋》四卷,其前二卷又称《医方药性》,后二卷又称《医方捷径》,前者载两种《药性赋》,一为四性药性赋,一是以自然分类法排列的药性赋,分为玉石、草、木、人、虫、鱼、果品、米谷、蔬菜、禽兽等,此后的《雷公药性赋》即以此为蓝本。除此还包括非韵语的诸品药性指掌、用药法象等。后者也含二种《药性赋》,其中一种名“诸品药性赋”,载药物歌诀183条;另一种名“增补分门别类药性”,按功能分类,简述炮制方法等。此外,前述陈嘉谟的《本草蒙筌》亦可归为此类,是书原为中医入门启蒙读物,为便于诵读,全书采用不甚规则的对语体裁,虽不像歌诀那样合于韵辙,但比一般文体更易于上口习诵。

清代药性歌诀仍很盛行,大部分皆附于医学或本草著作中。翟良的《医学启蒙汇编》卷六有“药性歌括”,分治风、热、湿、燥、寒、疮、食治等七门,收药372种,各撰药歌一首。史树骏编成于1671年的《经方衍义》中有《本草挈要》一篇,将药物分为草木果菜等八部,载药280种,每药编数句骈语。系屯子的《纂修医学入门》卷三为“药性赋”,将500余种药物编成五言诗,末附“心药赋”和“汤论”。冯兆张编于1694年的《冯氏锦囊秘录·痘疹全集》卷二载五篇痘疹药性赋,即“节制赋”、“权宜赋”、“指南赋”、“金镜赋”、“玉髓药性赋”。夏鼎撰于1695年的《幼科铁镜》卷六为“药性赋幼科摘要”,述药100余种,分为寒、热、温、平四类论述,每类之后有作者药论。蒲松龄有《伤寒药性赋》一篇,载于《聊斋文集》卷一,集《伤寒论》中药物89种编成歌诀。朱鎰编于1737年的《本草诗笺》共十卷,载常用药848种,先注其别名、产地、性味、炮制等,继编八句七言诗专述药性功效等。沈懋官的《医学要则》编成于1743年,其内附有“药性歌括”。何之蛟的《药性歌诀》二卷,附于何梦瑶《四诊韵语》中,集各种药性理论及316种药品编成歌诀,有五言七言不等。芝荪氏的《四言药性》收药460种,分为治风、热、湿、燥等九门,每药撰有四言药诀一首。其余有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不著抄人姓氏的